

湖南人民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诗学

主编 陆耀东
著 陈顺智



湖南人民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诗学

主编 陆耀东
著 陈顺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诗学/陈顺智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11

(中国诗学丛书/陆耀东主编)

ISBN 7-5438-2528-7

I. 魏... II. 陈... III. 诗歌-文学理论-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126 号

责任编辑: 曹有鹏 许久文

张志红 吴文娟

封面篆刻: 弘 征

装帧设计: 陈 新

魏晋南北朝诗学

陈顺智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0,000

ISBN 7-5438-2528-7

I·317 定价:15.50 元



总序

总序

这套《中国诗学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诗学概念,系取狭义。不过,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先秦乃至魏晋,往往是将诗与文(而且是广义的“文”,含历史、哲学、文学等)混合在一起谈论,故我们在解读古代诗学时,又不能不逾越狭义诗学的范畴。《丛书》的内容,涵盖中国古代诗词的理论、批评、鉴赏和 20 世纪的新诗诗学。它共分九卷,基本以朝代为序分卷,兼顾中国诗学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先秦两汉广义的诗学为第一卷;魏晋南北朝诗学,为第二卷;唐代诗学,为第三卷;宋代诗学,列为第四卷;明代诗学,为第五卷;清代诗学,为第六卷,但将晚清(以 1840 年为标志)划出与民国初年诗学(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合为近代诗学,为第七卷;从五四前夕至 40 年代末,为现代诗学,列为第八卷;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为当代诗学,列为第九卷。这种划分,我们虽然可以申述各种理由,但毋庸讳言,它也和其他分期方式一样,^①存在诸多困难与局限。

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如何估计和评价,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说:它零星的感悟多,鉴赏性的随感多,即使精

① 如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以诗学的发展线索为分期根据。



彩,也不过是吉光片羽,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云:它比西方的诗学更精彩,表面上看,它大多没有表述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在颗颗珍珠般的见解后面,有其内在联系和体系在。但不管是前者抑或后者,谁都不否认,中国诗学是一个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世界,是一个闪耀着无尽光辉的星海。是的,它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数以万计诗论家和诗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心血。有些诗学问题,从最初不免于粗泛的涉及或提出,到后来论述趋于周密精深,历经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之久。其间有冷静的学理探讨,有持不同观点的杂含意气的攻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深度的层层递进,也有前进途中的迂回曲折;有的是诗学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有的是理论转型期的过渡性成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温柔敦厚”和“思无邪”观念,显然意在以其规范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但其影响历时两千多年而不绝,值得深究。《文心雕龙》如书名所示,并非诗学专论,但含诗学在内,其精妙与文采,亘古未有,即使置于当时的世界诗学中,它也是罕见的经典性论著。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诗话”、“词话”大量出现,其中如《白石诗说》、《沧浪诗话》、《渔洋诗话》、《随园诗话》、《人间词话》等,虽并非均系原创性诗学,但都有各具特色的诗学理论做支撑,有的形体就具有系统性,有的则须由研究者加以梳理。以《沧浪诗话》为例,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诗辨”近似总论;“诗体”着重于论诗的体式;“诗法”总结诗的若干技巧问题;“诗评”主要为对诗人诗作的评论兼及批评方法及标准;“考证”有关于诗人事迹的追寻,有对作者、版本和诗篇、诗句的索隐和考证。对诗歌艺术的论述,相当系统。《沧浪诗话》有一段名言: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

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①

这是《沧浪诗话》的理论核心。严羽的诗论,虽不免有以禅喻诗的痕迹,然而由于他对诗的内在特性有深刻理解,因而精辟之见多多。

如所周知,中国诗学在先秦阶段尚处在胎萌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诗学,开始形成不同理论架构的雏形。魏晋、唐宋、明清是中国诗学的三个高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学的形成期,情思和格律的构建吸取了西域文化的异质影响,诗学从文、史、哲中走向独立,诗的格律理论趋向成熟。这一切,为唐诗高峰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准备了条件。唐宋不仅是我国诗词群山里顶峰中的顶峰,诗学也有很大发展,几乎论及中国诗学的所有问题,如“用事”、“自然”、“妙悟”、“神思”、“意境”、“形神”、“寄托”、情与景、诗与理、含蓄与直露、诗味、诗法、炼意、诗眼、比兴、声韵、风格、诗体等等诗学内部问题,无不涉及。意境说在王昌龄的《诗格》^②中正式提出后,影响深远。20世纪初美英流行的意象派诗的产生,即受唐诗流泽,不少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是诗人受中国古诗启迪而创作的。^③关于诗与理、诗与禅的关系的理论探讨,在宋代臻于极致。明清两代诗学论著繁富,其中不乏创见和新意,但大多系整合式成果。晚清民初,中国诗学从古典型向现代型过渡,外国诗学开始影响中国诗学,王国维是一代表。^④20世纪新诗诞生后,一些诗家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理论体系,胡适、闻一多、戴望舒、梁宗岱、朱自清、朱光潜、艾青、胡风、何其芳、袁可嘉等均做了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未能

总 序

① 《沧浪诗话·诗辨五》。

② 《诗格》,王昌龄作,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撰,姑存疑。有关“意境”一段原文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③ 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参见王牧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完成中国诗学的转型和重构。这,惟有待于 21 世纪了。应该说明:20 世纪中国学者对传统诗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史料的校勘、辑录、出版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在论著方面,从王国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以世界现代诗学观念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左”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和简单化,严重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进展。

《丛书》的主要依据为中国诗学理论批评文字,时或注意从诗词创作中总结出诗学理论,或联系诗词创作中的典型现象,或注意当时流行的欣赏习惯和鉴赏标准。在当时高层次诗人、学者所持的观念与一般读者中流行的审美观念之间,我们或重前者,或取兼顾。

《丛书》的总体设计工作由我承担。我的设想是:不着意于将它写成中国诗学史,尽管每一个卷也有对特定时段内诗学发展概况的勾勒,全景的鸟瞰,上承和下传,但限定所占篇幅不得超过该卷的四分之一;同时要求各位著作者致力于此时段内主要诗学理论问题的深入细致的探讨,阐明其对中国诗学的新贡献,尽可能地顾及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中国诗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求每一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获。

《丛书》企图贯彻“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比较准确地阐明各个时段的主要诗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并用现代诗学观对它进行再审视。参加本丛书撰写的有 12 人,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无法求得完全一致。为了不致于在大的原则上自相矛盾,我要求同仁在著述中贯彻下列观点:1. 诗必须首先是诗,诗学必须首先是诗之学,不能用任何别的“学”取代它、削弱它;2. 诗固然要表现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再现,日常生活中的情与诗情,一般的“意”与诗意,一般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等等,都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其分界线在“诗化”,前者未经“诗化”,严格说来,还在诗的宫墙之外;3. 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二者的创新与发展;4. 作为诗学,不能不触及内容与形

式的关系问题,我不主张机械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二者在具体作品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表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果在理论上对二者有偏至,都会产生消极后果,故不主张硬性地区分为第一、第二,而持并重论;5. 每个时间段的诗学都往往有多家多派,我不主张以某家某派为主臬,去要求各家各派,而期望俯视各家各派,既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因为各个流派互有短长优劣,少有一无可取者,也无十全十美者;6. 鉴于曾有忽视诗艺的偏向,我力主向这一方面倾斜……凡此种种,有的作者坚持自己的见解,我也不作强求,因为可能这种“坚持”,恰恰是书中的精粹所在。有的著作者放弃了或修正了原来的己见,迁就我持的观念,如果我这些看法有误和因我的失误而导致损害了专著的质量,则是我的过失和罪责。

总序

所有参与《丛书》撰稿者主观上都追求著作史料准确可靠、充实,论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诗学核心理论问题分析细致深入,有理论高度和深度,著作在整体上有较高学术水平,每一卷至少有若干章有著者的独到之见。凡借用已有成果处,一定加注说明,以免掠美。撰稿者和我虽竭尽全力,但因学识所限,加之时间紧迫,故每一本书,并非处处精彩,一是留下了明显的遗憾,如《宋代诗学》对词学理论未作专门论析,即是一例;二是个别处所难免存在谬误,恳请读者和方家指正。至于学术观点的歧异,我想,今天的学者当会视为正常现象。

本丛书的每一部书稿,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为了避免个人偏见和疏忽,还请几位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分别审读部分书稿,《先秦两汉诗学》是尚永亮教授,《魏晋南北朝诗学》是王启兴教授,《唐代诗学》是李中华教授,《宋代诗学》、《清代诗学》、《近代诗学》是陈文新教授,《明代诗学》是郑传寅教授。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劳绩。

这套丛书的出版,应该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他们出于对学术事业的热忱和远见,对这一课题特

别重视,他们是《丛书》的催生人,对《丛书》的出版始终给予全力支持;应该感谢为《丛书》撰稿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和协助我工作的同志们;感谢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负责同志,他们给了不少助力。我深深体会到:每本书虽是著者的成果,但也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劳动结晶。

陆耀东

2000年11月15日

魏晋南北朝诗学

总 序	陆耀东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六朝诗学发生的历史文化前提与背景 (3)	
第二节 六朝诗学发生的诗歌创作背景	(36)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诗学发展论	(44)
第一节 建安正始时期	(44)
一、曹植与曹丕的文学观念	(45)
二、玄学与正始时期的文学思想	(51)
第二节 两晋刘宋时期	(58)
一、陆机的诗学思想	(58)
二、挚虞与葛洪的诗学观点	(63)
三、陶渊明的诗学精神	(67)
第三节 齐梁陈时期	(76)
一、沈约与江淹的诗学观	(79)
二、刘勰的诗学思想	(81)
三、钟嵘的诗学思想	(94)
四、萧统的诗学观点	(117)
五、萧纲、萧绎的诗学观点	(120)
六、裴子野的复古诗学观	(12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诗学主客体论	(127)
第一节 本体论	(127)
一、汉儒的宇宙生成论与玄学的宇宙本体论 (127)	
二、文学的本体论与诗学的本体论	(134)
三、本体论的价值与诗学独立的意义	(145)
第二节 主体论	(147)
一、主体论出现的理论前提	(148)
二、个性论	(150)

三、性情论	(155)
第三节 主客体论	(163)
一、感物说	(163)
二、触物融情：主客体交融的两种方式	(168)
三、入兴贵闲：主客体交融的心理机制	(172)
四、意象论：主客体交融的诗歌结晶	(176)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诗学形式论	(181)
第一节 语言论	(182)
第二节 声律论	(188)
一、佛经“转读”说及其误区	(189)
二、清谈对声律的影响	(193)
三、四声本于“四象”说	(207)
四、“八病”略说	(223)
第三节 对偶论	(226)
一、对偶思维论	(226)
二、独体文字论	(235)
三、对偶发展论	(239)
第四节 典故论	(245)
一、典故的产生	(246)
二、典故的运用	(253)
三、典故的功能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61)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章

说到六朝文学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鲁迅曾经作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自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①此论一出，后世之论者莫不奉为圭臬，往往以此作为标准来评论六朝时期的文学。但是，如果对鲁迅的这一论断作出深究，那么就会发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说清楚，因为很多说法往往是语焉不详。譬如：何为自觉？何为人的自觉？何为文的自觉？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关系如何？如此等等，都需要界定。唯其如此，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迄今尚有较大的分歧，譬如对于何时自觉这一问题，除魏晋说之外，还有“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文学自觉说”，亦称为“西汉说”和“宋齐文学自觉说”；即便是“魏晋说”，又可分为“汉末魏初说”、“魏晋六朝说”、“魏初至北宋初期说”几种。诸说纷纭，未遑详述，仅举“西汉说”为例，以见其余。

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3），第5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西汉说”主要着眼于“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并且有了自觉创作”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从而认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创作开始初露端倪”，至“西汉时文章和学术”分离，“文、史、哲各部门的区分愈来愈明确”，刘向父子“他们把诗赋独立为一类，而与经传、诸子等相并列，说明他们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学不同于政治、哲学、历史等的独立地位”，“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术和文章的特点”。还有一点就是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专业文人创作”和“专业文人队伍”以及随之出现的大量辞赋作品。这些都充分说明“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新特点”已“表明文学已经独立和自觉”^①。

我们以为要拨开其迷雾，必须弄清下面一些问题。首先，文之自觉与人之自觉之关系如何？因为只有自觉之人，才能创造自觉之文学，才能进行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我们不可能想象在人还没有自觉的情况下便会出现已经自觉了的文学。其次，人的自觉究竟在什么时候？人到六朝时代，更准确地说是魏晋时期才自觉吗？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先秦诸子时代的大师们反而没有自觉了？如果自觉了，那么到了汉代反而导致人由自觉进入不自觉？而到魏晋又重新再度自觉？我们以为，这涉及到人的自觉的发展阶段性问题。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总体趋势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创造、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突飞猛进与循序渐进、甚至倒退交错进行的现象。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欧洲历史上辉煌的希腊、罗马时代与蒙昧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也同样难以面对诸子时代与汉代的神学主义和魏晋的个性精神。第三，如何来界定“自觉”的范围？自觉是指人的类自觉，还是个体自觉？从类自觉角度来看，应该是认识到人类与动物、自然界的区别，从而确立了人其所以作为人的类本质、

① 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类概念,及其不同于动物的存在方式。从个体自觉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一个”人对于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的确认,对于其个体价值的追求,对于其精神意识的崇尚。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类自觉是前提、条件,类自觉既为个体自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同时也规定约束着个体自觉的方向;而个体自觉应该是类自觉的最高表现,同时也充分表现出类自觉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方向;另外,类自觉中必然有着个体自觉的成份,同样,在个体自觉中也必然寓有类自觉的精神,只有这样,类自觉与个体自觉才能不断发展进步。由此可见,我们常常所说的魏晋乃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应当是指个体普遍自觉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先秦两汉没有个体的自觉,相对魏晋而言,先秦两汉更多的是类自觉,虽然其时也不乏像庄子、桓谭、王充这样充满自觉的个性意识的哲人智者,也虽然偶有像屈原这样的伟大诗人。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说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其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地表现出了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相反,如果以屈赋或汉赋的出现来证明文学早在战国、汉代已经自觉,那么我们可以以早期的洞穴壁画和陶器纹饰来证明中国绘画的自觉早在原始社会呢?又是否可以以《诗经》的出现来证明诗歌早在西周初期便已自觉呢?结论显而易见,尤其当我们将魏晋这一时代与两汉相比较时,魏晋文学乃至诗学之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就更加突显出来。因此,六朝诗学的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自然也就成为本论的核心问题。

第一节 六朝诗学发生的历史文化前提与背景

想要考察六朝诗学产生的背景,就必须首先考察六朝诗学产生的前提;要考察六朝诗学产生的前提,就必须考察有汉一代的思想文化历史;要考察有汉一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则必须首先考察其



经学。

秦始皇吞并六国、囊括天下之后，听信李斯之言，“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①，最终酿成“焚书坑儒”之惨剧。汉兴，解除挟书之禁，并诏告天下征求书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历时数十余年。最初，汉武帝所立之五经均是今文，总共有 14 家：

《诗经》：鲁，出于申公；齐，出于轅固生；韩，出于韩婴。

《书经》：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出于一源，皆伏生之所传。

《礼经》：大戴（德）；小戴（圣），二家皆高堂生之所传。

《易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均由田何之所传。

《春秋公羊传》：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毋生、董仲舒。

但与此同时，另有所谓古文经流传于民间。据《汉书·艺文志》载：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又据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即前代之古文。

古文经之传如下：古《易》为费直所传，古《书》为孔安国发其壁藏所得，古《诗》为毛公所传，古《周官》为河间献王所得，古《逸礼》则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春秋左氏传》则为张苍、贾谊等所传。由于今文学家之排斥，虽有刘歆于西汉末屡请将《左氏春秋》及《毛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但始终不得。自到王莽篡权,任用刘歆,古文经传方得立于博士。不久,光武帝复兴,又废除古文而专用今文。东汉以后,学者对今文家阴阳灾异之说渐感厌倦,古文亦随之受重视。其后名家辈出,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等,均以古文为宗;东汉末年,郑玄(康成)始兼今古文之长,遍注古今文群经,成为有汉一代经学的集大成人物。

作为两汉统治阶级哲学思想的汉代经学,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几点:

第一,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中国政治、学术、思想之伦理化是由于其所植根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决定的,并由此而形成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人类的早期大致都有过相同的道路:原始群居、氏族、部落,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但随着阶级的出现,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差异,血缘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有的日益强化,有的则渐被冲破。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形态就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前者很早就开始在海上从事工商业贸易活动,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形成了其流动性大、迁徙性强的生活方式,其原有的血缘关系也随之被冲破,并形成了以财产为中心的契约关系;而后者则长期在大河流域过着稳定定居的农耕生活,这种亚细亚式的农耕方式和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它们不仅无法冲破原有的血缘关系,而且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延续而日益强化。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亲亲”与“尊尊”。因之在中国,伦理道德规范最丰富最完备,如《尚书·皋陶谟》最早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继而建立起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孟子进一步概括为“五伦十教”,法家提出“四维八德”,此后人们又将其概括为“六德”、“六行”、“四



维”、“八德”等等。因之，在人类早期蒙昧时代就已产生的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得以长期保留下来。西周建立之后，周公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之上“制礼作乐”确立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从形式上看，固然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由此形成了中国家国同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政治结构，也就是说家族、家庭的组织结构形式被直接套用于国家的政治结构之中，一个国家的统治，从实质上言就是一个家族的统治。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等一些制度。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从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并将此前的各种德目，概括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如此便完整地将先秦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封建政治体制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使两汉的政治制度充满伦理色彩，也使伦理道德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如果说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那么它的外在形式特点就是经学及其传统。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虽然每代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其骨干却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尤其是在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儒经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且成为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此后历代官方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一种统摄性的学问，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样原本在先秦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的学科，由于政治力量的参与，给其他学科带来了几乎是笼罩性的影响：一方面儒家的经学思想广泛渗透到历史、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文学等学科；另一方面经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它不断扩充、不断膨胀，最终挤压淹没、涵盖包容甚至取代了其他学科，从而使其他学科无法充分独立出来，更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有人曾以中国古代融会各种知识的“类书”与西方的“百科全书”作过比较。例如，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共有 46 个部，其中